

傅璇琮先生主持编纂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，出版了两个版本，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和中华书局2014年11月版。我是这一著作之参与者，不具备写书评之资格，但有关此书之成书过程、学术价值以及存在问题，又觉有必要给学者与读者作必要的说明。

明代中叶因前后七子之倡导，宗唐风气鼎盛，各种唐诗选本不断问世。最权威的当然是唐人自己的选本。最早出现佚名编《唐人选唐诗六种》，包括元结《篋中集》、芮挺章《国秀集》、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、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、佚名《搜玉小集》和姚合《极玄集》，有嘉靖刻本。明末毛晋编《唐人选唐诗八种》，增加令狐楚《御览诗》和韦毅《才调集》，有崇祯元年（1628）汲古阁刻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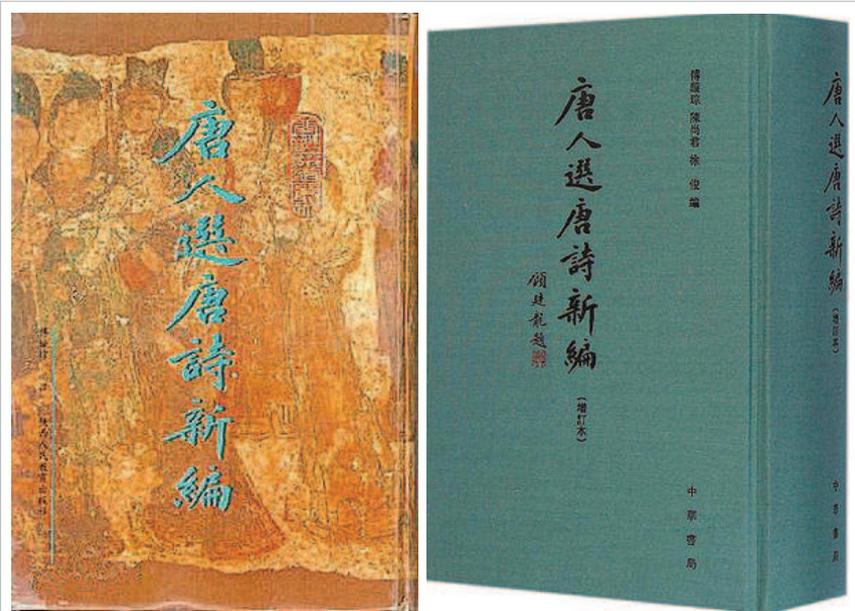
入清，王士禛编选《十种唐诗选》，除毛刻八种的再作遴选外，增加《又玄集选》和《唐文粹诗选》十种，有康熙刻本。其中《又玄集选》所据为伪本，《唐文粹》为北宋姚铉编。王氏为诗坛领袖，所编影响很大，虽不称唐人选唐诗，而以唐选为主。1958年12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集印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，除毛氏八种外，增加罗振玉据敦煌文本编刻的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和传归不久的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刻韦庄《又玄集》二种。此后曾多次印行，影响较大。

傅璇琮先生拟重新编定唐人选唐诗，最初设想，1990年春在常熟虞山宾馆开《全唐五代诗》工作会议期间，与我谈及。他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委托编一套《唐诗研究集成》，他有一些初步设想，也征求我的意见。谈了许多，后来确定的有陶敏《全唐诗人姓名汇考》、佟培基《全唐诗重出误收考》、张伯伟《全唐五代诗格校考》、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之得成立，一是鉴于《十种》中部分选本版本不佳，二是可以有新的文本补入。当时学术著作出版

濠上漫与

述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

■陈尚君

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(左)、中华书局版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

极其困难，课题立项更谈不上，但凡出版社约稿，出版有保证，学者都乐于从命。历时五六年，这套书方问世。

《新编》剔除了《十种》所收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。罗振玉当年刊布，是依据伯希和提供的法藏敦煌写本，一时矜为秘宝。敦煌文本全部刊布，知此卷即P.2567号写本，后半可接P.2552号写本，属唐诗写本，类似写本在敦煌文本中很多，与选本有别。《新编》1996年本增加了四种选本，即崔融《珠英集》、佚名《翰林学士集》、殷璠《丹阳集》和李康成《玉台后咏》。《珠英集》由中华书局编辑（当时，现任总经理）徐俊先生整理，后三种由我执笔。《珠英集》五卷是崔融于武后末年编纂《三教珠英》时，编选同僚26人诗作而成，

敦煌文书中存P.3771、S.2717两个文本，为原书卷四、卷五之残本，存13位作者诗近50首，多存佚诗，特别珍贵。《翰林学士集》为日本尾张国真福寺存唐写卷，今存名古屋真福寺。清末由贵阳陈田影写刊布。其内容为太宗君臣之唱和诗，存51首，《全唐诗》仅收12首。书名为后人所题，日本学者对原集名有许多推测，我则认为即许敬宗集之残帙。殷璠是盛唐最有名的诗选家，今知先后编选过《丹阳集》《荆扬挺秀集》和《河岳英灵集》三部选本，仅《河岳英灵集》存。宋人编《吟窗杂录》存有《丹阳集》的部分残文，可以展示该集的部分面貌，知道该集仅选润州十八人诗作，约成于开元末，以强调风骨为宗旨。《玉台后咏》是徐陵《玉台新

刻二卷本，可纠正后世妄分为三卷以附会三品论诗说，录诗文本也更为准确。《中兴间气集》用近代武进费氏影宋本，也比明刊为优。特别需要说到的是，姚合《极玄集》以往通行的是明刊二卷本，每位诗人下皆有小传，以往认为亦出姚合手笔。当年傅先生委托我代校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写宋刊一卷本，发现全无小传，收诗与明刊也有所不同。我认为小传为后人增写，不是唐代文字，告诉傅先生，幸为他所采纳。

《新编》2014年新本，与1996年本比较，除各集略有增补增校外，新增加了三种文本，收书达到了16种。新增三书是：一、蔡省风编《瑶台新咏集》，宋人著录此集收“唐世能诗妇人李季兰至程长文二十三人题咏一百十五首”，俄

藏敦煌文书发现残本，存李季兰、元淳、张夫人、崔仲容四人诗23首，应为该集之卷首部分。这是唐代唯一专选女性诗歌的选本，至可珍惜。二、《元和三舍人集》，收中唐令狐楚、王涯、张仲素三人五七言绝句119首，所据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。三、褚藏言《窈氏联珠集》，收中唐窈常、窈牟、窈群、窈庠、窈巩兄弟五人诗，每人各20首，总为100首，另附唱和诸人诗。

《新编》对研究唐代诗学的意义显而易见，这里不讨论。傅先生在《增订本序》中已经说到，《窈氏联珠集》《元和三舍人集》有合集的性质，有些则是酬唱集（如《翰林学士集》），但从提供文献来说，则有必要。《元和三舍人集》早在1994年就做好了，初版未收。但国内孤本，确实有介绍的价值。据我分析，此书即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之《翰林歌词》，是三人同任学士时的职务作品。遗憾的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未获参校。《窈氏联珠集》则是唐代唯一存世的家集，五人各收诗20首，确是选本。《瑶台新咏集》由徐俊先生整理，仅据敦煌文本，我则比较倾向认为《又玄集》卷下和《吟窗杂录》卷三〇《古今才妇》所录李季兰至程长文诸人诗，皆出自该集，详见《文史知识》2017年10期刊拙文《〈瑶台新咏〉所见唐代女才子的感情世界》。至于《翰林学士集》，从一般来说是总集，在我之判断则属于别集，因此才能解释该集目录以太宗诗附收于许敬宗诗下的体例。

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不断摸索前进的工作，学者虽年资早晚有别，地位高下不同，凡所见有异，应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析，求同存异。傅先生长期倡导这种学术态度，我曾追随逾30年，做过许多文献编写的工作，合作都愉快。学术问题见解有异，当面告知或形诸公开文字，都无妨友谊，对此有特别强烈的感受。傅先生辞世已两年多，述此以为纪念。

《鲁迅全集》注释小议一则

■尧育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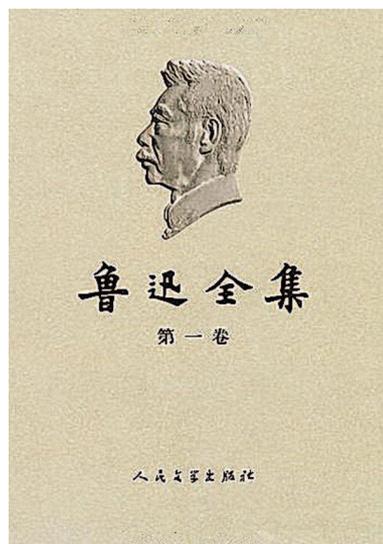
《鲁迅全集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）第二卷《四库全书珍本》一文注释“明人好刻古书而书亡”句云：“清代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卷一《六经雅言图辨跋》中，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，说过这样的话：‘明人书帕本，大抵如是，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。’”这注释乍一看，颇得其实。然而细校起来，恐未为妥。

陆心源（1834—1894）说那句话的背景是，明成化年间有人将《六经雅言图辨》更名为《六经奥论》刊布，且误将郑樵列为作者。这种妄改书名、错误安插作者的行为，乃是明代书帕本的常见手法。对此，陆心源发出明人“刻书而书亡”的感慨。所谓书帕本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二·集部四十五在论及天一阁藏《群公小简》时云：“盖明代朝觐述职之官，例以一书一帕赠京中亲故。其书皆潦草刊版，苟应故事，谓之书帕本。”可见书帕本起初是作为礼物而产生的，存在潦草刊版等现象，非是

善本。然而，鲁迅在正文中所云乃是：“明末人好名，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，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，以为错字，随手乱改。不改尚可，一改，可就反而改错了，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，说是‘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’。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表述，他所点明的时代是“明末”，明人好刻书的缘故是“好名”，至于说出那句话的则是“考据家”。而陆心源《六经雅言图辨跋》所针对的是明中前期成化年间的刻本，且刊刻书帕本的动因在送礼，与鲁迅所说似不相符。更为重要的是陆心源并非以“考据家”知名，在鲁迅笔下，陆心源主要是知名藏书家，如鲁迅在1925年所写《忽然想到六》中提及“外国人所得的古董，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。即不然，归安陆氏的韶宋，潍县陈氏的十钟，其子孙尚能世守否。”

在鲁迅眼中，考据学者当另有其人。

他曾批评乾嘉考据学者云：“清初学者，是纵论唐宋，搜讨前明遗闻的，文字狱后，乃专事研究错字，争论生日，变了‘邻猫生子’的学者。”乾嘉学者“专门研究错字”，与《四库全书珍本》中所言“以为错字，随手乱改”的批评正可吻合。而乾隆时期恰好有一位学者先于陆心源发出“明人刻书而书亡”的论调。此人乃是赵一清（1709—1764）。赵一清是浙江仁和人，是著名学者全祖望的学生，在《水经注》一书的研究上卓有成就。赵氏在校勘《水经注》时，发觉明人杨慎因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枝蔓繁琐，因而删除了《水经注》中郦道元注释的部分。杨慎删定成的《水经》经其孙杨宗吾刊行，流布后世。赵一清对此颇为不满，不无愤慨地说：“吾是以叹明人刻书而书亡，而正杨之作不可以已也。”（《水经注释·附录下》）赵一清所要做的工作之一便是纠正杨慎的行为。至于他的感慨——“明人刻书而书亡”，当是鲁迅“明人好刻古书而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。

亡”的原始出处。注释典故，当力求其最早出处，且最符合语境者，因此，此条注释宜改为：“清人赵一清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，说过这样的话：‘吾是以叹明人刻书而书亡，而正杨之作不可以已也’。所谓‘正杨’，是指改正明朝好改古书的杨慎的错误。”